

---

# 彷彿若有光：

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小傳<sup>1</sup>

羅小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

站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這三十年，既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整個體制變革、社會轉型，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狀況迅速變遷的三十年，也是各種力量匯聚湧動，為中國社會面對日後的變革激盪打下基礎、孕育可能

---

1 認識千野拓政老師、接受其教誨的過程，也是我經由中國現當代文學，接觸、學習進而從事文化研究的過程。在我看來，作為其在中國大陸的晚輩，沒有什麼比撰寫一篇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發生發展的小史，更適合用來向千野老師同樣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的學術生涯致敬的了。更何況，就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發展而言，今後的十年將是難以預料的十年。藉由撰寫本文的機會，在關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發展的千野老師的紀念文集中保存這一小史，提供一個觀測未來的視角，是非常有意義的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也是千野老師讓我和本文的日文譯者池田智惠教授在年輕時因為文化研究而相識，一路走來，成為研究和生活上的朋友。也希望這篇文章可以保存我們那一部分共同的青春和信念。

或帶來限定的30年。<sup>2</sup>當全球新冠疫情告一段落，無論是目睹「去全球化」呼聲的日漸高漲、新自由主義的加速退潮，還是將中美間的貿易戰視為「新冷戰」的開始，再次「被開放」的中國人都赫然發現，已不復身處那個之前熱烈擁抱的全球世界。整個中國社會，學術思想界也罷，經歷了高歌猛進的經濟增長期的普通人也好，大家又站到了重新認識世界，理解其內在邏輯的岔路口。彼此間的分歧不可謂不大，來自於前30年的慣性、執念和由此集聚的能量與戾氣，不可謂不足。好在，這樣的歧路並不陌生。魯迅當年更是傳授過對付它的方法：「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以走的路再走」。<sup>3</sup>如此一來，回顧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在社會內部發生發展的這段歷史，也就構成了文化研究——特別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展開的這一支，在當前這一路口坐下，養點精神再走的必要步驟。這也是在當代中國思考左翼實踐的一條重要線索。

概括來說，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發生發展的歷史，離不開兩條

- 
- 2 一般來說，人們把改革開放的起點定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因此，早在2008年前後，就已經出現了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的分段法。而本文所使用的前30年，則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之所以選擇這一起點，是因為在此之後，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界討論和思考中國問題，都主動或被動地被導向了一切從經濟出發、擱置政治的這一路徑上來。整個中國大陸文化研究，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得以發生。因此，本文選擇了這一與文化研究的發生發展更為契合的分段法。顯然，這一分段法自有其優缺點。優點在於可以幫助人們在這一背景下審視文化研究的發生與進展。缺點則同樣明顯，正是這樣的社會大背景構成了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發展的先天缺陷。而能否跳脫出這一期所規定的思考路徑，不光是文化研究，也是整個人文學科的難點所在。
  - 3 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5。

線索的交織。一條線索圍繞「什麼是文化研究」展開。這是因為，對於後發國家的人文學科來說，「文化研究」自有其「理論旅行」的一面。它往往被視為一股緣起於英國，流行於美國，由此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新興的學術思潮，並在上世紀90年代作為「新學」傳入中國學界。其進入中國的時間表，和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時間表幾乎同步。而另一條線索則關注「為什麼是文化研究」。這是因為，文化研究作為一種跨學科的思想方法，傾向於在整體性的社會危機之中，將「文化」視為克服危機的重要力量。<sup>4</sup>通過描述文化狀況，把握進而回應中國社會正在遭遇的整體性危機，也就構成了文化研究扎根於這片社會土壤，持續演進的重要線索。

既有的回溯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歷史的文章，大多偏於第一條線索，忽視第二條。本文為自己規定的任務則是，通過發生於19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兩場大討論所勾勒的社會整體性危機，將「什麼是文化研究」和「為什麼是文化研究」這兩條線索交織到一起，置於中國大陸的社會語境中加以考察，說明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在此中興起的內在動力，以及它作為左翼實踐的一種可能。在此基礎上，通過記錄有代表性的個案，說明其在體制內外演進的狀況與趨勢，展望其未來。

## 一、1990年代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危機：「人文精神大討論」

顯然，每一個社會內部，總有某些領域的人對社會整體性危機

---

4 此處選用雷蒙·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中給出的文化研究所理解的文化的界定。

的到來更為敏感，為此發出警報。在1992年後的中國社會，發出警報的是文學領域。其標誌是發生於1990年代中期的那一場歷時兩年有餘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這場大討論的背景是，1992年的冬天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重啟市場經濟。這既使得1989年之後幾乎陷於停頓的中國社會重又活潑了起來，也使得此後，無論是國家的發展還是個人的前途，都被高度收縮進了經濟領域。「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在社會中瀰漫。文人也在這一潮流中下海經商；比如，王朔、張賢亮、魏明倫等當時比較知名的文人都開起了公司。在這一背景下，《上海文學》雜誌恢復了名為「批評家俱樂部」的欄目。1993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的學者王曉明、張宏、徐麟、崔宜明、張檸在上面發表了名為〈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的討論整理稿，通過批評當時的兩種文化現象——王朔的痞子文學和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指出這類商業化文化的流行「暴露了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危機」。這一年的冬天，華東師大召開全國文藝理論學會年會。藉此機會，王曉明又約大家晚上進一步討論這個話題。旁聽了現場的討論後，《讀書》主編沈昌文對此表示支持。1994年第3期開始，《讀書》以「人文精神尋思錄」為名，連續發表6期討論稿。「人文精神大討論」由此被推向了全國，很快成為一個媒體事件。1994年8月起，《文匯報》（上海）、《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北京）和《作家報》（濟南）闢出「人文精神」討論的專欄；《長江日報》、《明報月刊》以專輯方式刊發報導與文章。這中間不斷有學者加入討論，且支持、反對、質疑、問難的立場各有不同。1996年2月，王曉明主編的《人文精神尋思錄》出版，從提倡、質疑、回應和理解四個方面選取有代表性的文章，為這場討論立此存照。

這種通過大規模討論凸顯社會整體性危機的做法，既離不開中

國文人的深層傳統，也離不開建國後的學科體制、文藝制度與現代國家構建之間的關係，<sup>5</sup>更離不開此時已成為餘緒的1980年代公開討論的風氣。雖然參與者的程度參差，推進有限，且在事後來看有很大的局限，但無論其規模還是各抒己見的程度，在只看重流量經濟的今天，這樣的討論都難再現。那麼，這場「大討論」究竟是如何描述整體性的社會危機，進而引發如此反響的呢？

討論伊始，王曉明這樣描述他們感受到的社會變化：

今天，文學的危機已經非常明顯，文學雜誌紛紛轉向，新作品的品質普遍下降，有鑒賞力的讀者日益減少，作家和批評家當中發現自己選錯了行當，於是踴躍下海的人，倒越來越多。……一股極富中國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幾乎要將文學界連根拔起，……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早已經對文學失去興趣了。<sup>6</sup>

很多人在批評這一討論時認為，這一類描述是知識分子對於由市場化經濟導致的自身被邊緣化表達不滿。<sup>7</sup>但這種迅速將人簡化為社會

---

5 這組關係的討論，可以參考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具體到文化研究的發生，則參見王曉明，《從文藝學到文化研究》（視頻），<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q4y1P7r7/>（2023年5月16日檢索）。

6 王曉明、張宏、徐麟、張檸、崔宜明，〈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收錄於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頁1-2。

7 這一批評本身並非全無道理。但在如何判斷整個社會結構中中心與邊緣的標準這一根本問題上，這一批評與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並未形成交鋒。即對於人文精神的提倡者而言，誰來定義和規範一個社會的中心與邊緣，是其更為深層的焦慮。而這樣的焦慮在批評者那裡卻被直接轉化為在承認既有的標準的前提下爭奪中心的社會化過

地位或階級屬性的做法，顯然無法把握住整個人文精神討論的核心意圖。因為整場討論試圖捕捉的，是在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中，人的精神生活在質地上的變化。而精神生活的質地，又恰恰是在此過程中，既無法依靠既有的結構和階級來鎖定，也不能指望在結構變動之後必然覆現的東西。王曉明繼續指出：

照我的理解，愛好文學、音樂或美術，是現代文明人的一項基本品質。一個人除了吃飽喝足，建家立業，總還有些審美的欲望吧，他對自己的生存狀況，也總會有些理不大清楚的感受需要品味，有些無以名狀的疑惑想要探究？……假如我們確實如此，那就會從心底裡需要文學，需要藝術，它正是我們從直覺上把握生存境遇的基本方式，是每個個人達到精神的自由狀態的基本途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文學自有它不可褻瀆的神聖性。尤其是在20世紀的中國，大多數人對哲學、史學以至音樂、美術等等的興趣，都明顯弱於對文學的興趣，文學就更成為我們發展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了。因此，今天的文學危機是一個觸目的標誌，不但標誌了公眾文化素養的普遍下降，更標誌著整整幾代人精神素質的持續惡化。<sup>8</sup>

這段寫於1993年的話，提示出「南巡講話」以來，被經濟高速發展所掩蓋，又在經濟增速放緩之後，開始大規模暴露出來的一個社會的精神生活如何展開的問題。顯然，無論經濟如何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如何提高，國力如何強盛，生活著的人們都需要一套說明和把

---

程。

8 前揭書，頁2。



握生存狀況的理解模式，據此展開精神生活，並通過精神生活裡的自由狀態來體驗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每個時代，個體所能理解和體驗到的自由並不完全相同，甚至於差異很大。<sup>9</sup>但無論有多大的差異，不經由對精神的自由狀態的理解，人把握其生存境遇的能力就是不完整的。當這樣的不完整連接成片、積水成淵的時候，勢必導致社會運轉的重大危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學的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人人文精神的危機，整個社會對文學的冷淡，正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我們已經對發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喪失了興趣」。<sup>10</sup>顯然，這個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都興奮於市場經濟帶來的變化，憧憬著未來的美好生活，對與此一併到來的精神生活的萎縮，既不關心也不擔憂。這種喪失興趣或漠不關心的背後，是一種共同的精神立足點的後退，從「文學應該幫助人強化和發展對生活的感應能力」這個立場的後退，甚至是從「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著精神價值」這個立場的後退。這種全面的後退，成為「人文精神大討論」努力標定出的社會危機的基本面目。於是，一邊是物質生活水準的整體上升，一邊是體驗精神生活的能力的集體喪失，這一此消彼長的不平衡狀態，構成了此後中國社會整體性危機的根源。

在討論展開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採取兩種立場，來反對或解構這種對整體性危機的描述。一種是主張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擁抱大眾文化，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便是王朔們的選擇。其背後的潛臺詞是，市場引導的大眾文化能夠確保精神能力的健全，保障人們的精神生

---

9 這一自由，並不是今天中國年輕人掛在嘴邊的那些具體明晰的要求——扔垃圾的自由，吃水果的自由，財務自由或躺平的自由，而是這些要求背後發生著作用，促成它們成型的精神底氣。它的存在，構成了一個人能否體驗他所擁有的生命的基本條件。

10 前揭書，頁2。

活。另一種則立足於後現代主義，嘲笑啟蒙，解構一切。這兩種意見，立場雖不同，但採取的策略大同小異。即在討論過程中抓小放大，通過將矛頭指向提倡者——認為用「人文精神的失落」來指認危機，不過是一種精英主義或知識分子被奪權的表現——來迴避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活狀況以及人們展開這種生活的能力問題。事後來看，這兩種反對的聲音，不僅在當時的公共討論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此後文化市場化的過程中發揮作用，且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發展進程中占據一席之地。換言之，1990年代中期的這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基本呈現出了在所謂的擱置意識形態爭論的現實條件下，知識者在文化與經濟間的角力中所能採取的基本立場、理解方式和介入路徑。

對此，對這一討論的主旨抱有同情但不完全贊同的人們，則認為較之於「人文精神」，更應關注社會巨變中隱而未發的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比如，汪暉認為：

啟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毛的社會主義嘗試時曾經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性，但是面對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社會危機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把現實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歸結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迴避導致「知識分子」階層發生變化的社會條件，其根源之一就是「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對這個社會過程本身持有極為曖昧的矛盾態度。<sup>11</sup>

---

11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收錄於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81-82。



陶東風則認為，這場討論並沒有觸及大眾文化的根本缺陷，「『人文精神』論者沒能看到大眾消費主義的真正危害不是什麼缺乏抽象的『理想』、『崇高』、『終極關懷』，而是以娛樂的自由和消費的自由取代了政治的自由，以娛樂消費領域的畸形繁榮掩蓋了公共政治領域的萎縮，以消費熱情掩蓋了政治冷漠」。<sup>12</sup>林賢治在〈關於「人文精神大討論」〉中更有兩點批評：一是討論者迴避了1980年代末的大事件，儘管這實際上構成所謂「人文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二是沒能接續11屆三中全會前後，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sup>13</sup>這些事後的評論各有側重、遙相呼應。一方面，進一步標明了「人文精神大討論」之所以如此展開的社會背景：改革開放實際上是當權者對於既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模式的「自助式」取捨與雜糅。這使得此時的中國社會進入的，勢必是一個遠比單純的資本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國家更為複雜的演變進程。但另一方面，若僅靠提倡人文精神無法應付這一複雜的演變過程，那麼思想界又應該如何介入其中，發揮文化思想的力量，為精神生活的展開而非萎縮提供新的可能？對於這個問題，評論者卻也沒有自己的回答。

正是經過兩年多的大討論及其迴響，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上述危機的複雜與難解，或明確或朦朧地把握到，「在1990年代的歷史情境中，中國的消費主義文化的興起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而且是一個政治性事件，因為這種消費主義的文化對公眾日常生活的滲透實際上完成了一個統治意識形態的再造過程」。<sup>14</sup>而一旦如此，試

---

12 陶東風編，《當代文藝思潮與文化熱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6。

13 林賢治，〈關於「人文精神大討論」〉，<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264.html>（2023年5月17日檢索）

14 前揭書，頁84。

圖在危機中有所作為的知識者就會發現，搞清楚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再造的過程，把握文化在其中發揮力量的路徑，進而對它與精神能力的關聯展開思考與批評，也就變得十分關鍵。換言之，一旦將這種政治領域的萎縮和消費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間的互為因果，作為中國社會整體性危機得以形成的現實條件來把握時，文化研究的思考路徑也就成為必然的選項。<sup>15</sup>而對於這一危機的理解的深度和把握的廣度，更是決定了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此後自覺生長的能力。

可以說，正是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率先標示出了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得以出現時的社會狀況。這種狀況，就國內而言，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全面鋪開，舊有的單位體制開始鬆動，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由此出現，城鄉之間種種的不平等越發凸顯。消費文化大舉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日漸成為商品之一種。在此基礎上，以城市生活為主導的新一輪生活方式開始形成。就外部狀況而言，是在柏林牆倒塌之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冷戰格局在當時看來是就此結束。資本在全球範圍內大張旗鼓的流動，對於不同制度的現代國家，最終也包括占據霸權位置的第一世界的國家形成巨大的衝擊。此時中國人文領域的知識者，面臨和當年英國伯明罕學派類似的困境：<sup>16</sup>經濟狀況上去了，但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

---

15 另一個選項，則是思想史的研究。在這裡，思想史和文化研究構成了應對這一危機既彼此呼應又各有側重的選擇。

16 霍爾指出，英國之所以出現文化研究，是要回答一個非常具體的政治問題：「在經濟富足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發生了什麼變化？」（《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論史》，周敏、程孟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頁23。）默多克則將這一困境概括為：「原有的公民身分和公民責任因為消費主義的魅力和自我實現的承諾而迅速黯然失色」。默多克〈序二〉，姚建華編著，《傳播政治學經典文獻選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9。

集體心智卻並沒有一併好轉，反而顯出後退與腐壞的跡象。正是在這一整體性危機中，記錄、協調乃至供給著人們對社會、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的這些變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續的反應的「文化」，被凸顯出來。專注於此，對其展開辨析和研究的衝動，也就呼之欲出了。

## 二、從「生活在不可解之中」到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

由此，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發生，並非源於某個理論的引介，<sup>17</sup>而是因為中國社會在政治領域繼續封閉的狀況下，開始了領略消費主義文化的力量這一個階段。當這一社會變動在中國大地上真實地發生，原有的路徑無法提供解釋，新的思想運動勢必出現。文化研究正是其中之一，且是其中十分強勁有力，試圖對此正面阻擊的一支。正如汪暉在當時概括的那樣，「正是獨特的社會政治結構與商業化的結合及其產生的種種後果，構成了大陸學者討論『文化研究與文化空間』的主要背景」。<sup>18</sup>站在今天來看，我們可以再加一句，社會政治結構與商業化的這種獨特結合越是深入，後果表現得越是明顯的地方，就越是湧現出對於「文化研究」的自覺的熱情。<sup>19</sup>

其中，標誌性的事件是由《讀書》發表的一組對談和召開的一個討論會。

---

17 比如有的論述文章將1985年的詹明信接受北大邀請來華講學，介紹1960年代以來流行於西方學術界的文化研究理論與成果作為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起點。見孟登迎，〈「文化研究」的英國傳統、美國來路與中國實踐〉，《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第1期，頁37。

18 汪暉，〈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電影研究》，1995年1月，總240期，頁14。

19 這也是文化研究率先出現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的高校的重要原因。

1994年7月和8月，《讀書》雜誌發表了李歐梵與汪暉關於「什麼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與地區研究」的對談。在這次對談中，現代文學研究出身的李歐梵介紹了興起於英國，於十年前開始流行於美國學界的文化研究。這一介紹涉及到之後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展開時的一系列核心議題，比如，反抗西方文化霸權，中國社會的本土經驗和實踐性，中國本土與世界全球化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三世界團結與聯合等，且包含了對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後殖民理論、以及對彼時放棄了行動而僅限於理論的美國左翼的批評性意見。換言之，文化研究被介紹進中國大陸的學界之際，便帶有雙重視野：一是意識到此時美國的人文學界業已陷入了過於專業化和碎片化的危機，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是其拿來自我更新的一帖解藥。然而，與此同時，在無可行動的社會狀況下將一切理論視為政治，也是施藥帶來的結果之一，中國大陸學界應引以為戒。同年9月，《讀書》舉辦了名為「文化研究與文化空間」的討論會。這場討論，不僅涉及到文學、美術、社會學、哲學、建築學等多門學科，且關乎政治、經濟體制、國家政策、多種媒體的運作、中西的制度性差異與理論本土化的可能性等問題。在當年12月的《讀書》上，白露發表了討論會的紀錄和感想，標題便是〈生活在「不可解之中」〉。這個標題頗為準確地勾勒出市場經濟衝擊之下人們的基本感受：一切都在迅速地變化著，很多變化還未得到解釋，便被新一輪的變化覆蓋更迭。正是在這一感受的席捲之下，文化研究成為迎戰這一「不可解」的思想運動。參與在這一運動中的人們，學科背景不盡相同，關注焦點各有側重，但努力的方向卻大體一致，就是承擔起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重新理解中國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生產這一巨大的任務，對由資本市場、國家權力和既有的現代性理論所共同構築的1990年代之後的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樣態和社會趨勢做出分析和說明，由此拓展當代中國人

把握和理解世界的能力。可以說，《讀書》刊發的這組對談和主辦的討論會，較為集中地呈現出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最初發生時的面目和雄心。

此後，並不直接相關卻構成了文化研究在新世紀進一步展開時重要的思考背景的，是世紀之交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爆發於這一時間點的討論，<sup>20</sup>源於對中國正在加入的「全球世界」的判斷，出現了根本性的分歧。換言之，當中國日益深入到全球化的生產鏈條之中，在對這一狀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後，中國思想界對於市場、世界以及中國自身的位置勢必產生不同的看法。<sup>21</sup>對於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來說，以歐美社會為主導的世界圖景以相對籠統的「現代」、「民主」和「自由」的美好面目出現。這使得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也包括經歷了上山下鄉、重新回到城市的知識分子們，對此充滿了憧憬和嚮往。能否儘快實現現代化，被視為中國社會種種結構性矛盾的解決之道。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則準備不足。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是因準備不足而來的第一次集體性反彈，那麼，世紀之交，加速推進的市場經濟，終於將過去離得很遠看起來很朦朧的世界攤開在眼前。當中國社會與這樣的世界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切實的感受後，原本朦朧的「全球世界」，勢必被重估。它包含了對這樣一組問題的再思考：中國社會的市場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國際條件下發生的？應該如何定義中國正在與之接軌的「世界」，並據此理解和確認「中國」對於這個「全

---

20 其中的標示性事件是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21 其中，頗為典型的就是在《天涯》和《中國改革》上分別發表刪節版的三人談。秦暉、汪暉、溫鐵軍，〈超越派性之爭尋找變革道路〉，《中國改革》第10期（2003），頁11-14；溫鐵軍、汪暉、秦暉，〈中國能否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天涯》第4期（2003）。



球世界」的意義和位置？

正是這一重估，將人們分為了兩個陣營——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其中，新左派的基本看法是，1980年代中國啟動的改革開放，實際上隸屬於19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克服自身經濟危機而開啟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進程。類似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者大衛·哈威撰寫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有非常明確的論述：

1980年代期間，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國際貿易中的力量越來越大，將整個世界開放給轉型市場和金融力量。就此而言，這為中國乘亂進入並融合到世界市場打開了空間，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這一過程是不可能的。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的醒目出場，部分而言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所帶來的**意外結果**。<sup>22</sup>

有意思的是，到了2022年，《金融時報》的全球商業評論員及副主編拉娜·弗洛哈（Rana Foroohar）在〈新自由主義之後：世界政經加速「區域化」〉中，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契機給出了相類似的描述。她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有效通行，是因為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之間的關係沒有失衡。這使得美國消費者在盡享全球製造業的物美價廉的同時，讓全球數十億人擺脫了貧困。然而，「到了2000年，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區域發展不均衡等諸多後果，已經不容忽視」，而這一打破平衡的重要舉措，就是美國積極推動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sup>23</sup>兩位學者的立場不同，但在描述中國

---

22 大衛·哈威（David Harvey）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頁138。著重號為筆者所標。

23 Rana Foroohar, “After Neoliberalism: All Economics Is Local,”



加入全球世界的狀況時，卻頗有一致之處。當時，中國的新左派對於全球世界的判斷，也與此類似，儘管並沒有人在當時便預見到十年後由中國的「意外加入」導致的世界格局的大變動。他們意識到的只是，這個中國正在加入的全球化進程，看起來是由「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組織起來，實際上卻是在抽象的「市場」之名下，通過權力和跨國資本的聯手，經由一系列政治性安排對落後國家和地區展開掠奪性的開發和貿易，持續製造出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和不正義。正視這一構建全球不平等機制的所謂「自由貿易」的進程，批判由此出現的不正義與不公正，重新定位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位置和可能的作用——城鄉關係、國家權力、社會主義的歷史等等，也就成為這一大判斷下得以展開的新思路。

可以說，敏感於這一由新自由主義所推動的全球狀況，意識到由「自由市場」導致的不平等問題，使得新左派形成了對於現代化進程更為歷史化也更為批判性的看法。這一系列判斷在很長時間內成為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得以展開的重要依據。當然，從後見之明來看，這一判斷同樣蘊含著此後導致中國左派知識分子進一步蛻變分化的要素——比如對於國家權力的重視、對中國特色的關注等，儘管這些變化要等到2008年之後才日益尖銳起來。

這並不是說爭論的另一邊，被稱為「自由主義」的論戰者便沒有注意到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進程中的作用。區別在於，新左派選擇就此質疑「市場」，視之為在西方資本主義展開掠奪過程中形成的一套與壟斷性權力密不可分的政治經濟理論，自由主義者卻更看重「市場」——作為一種抽象的理念以及其實際展開過程中形成的更具流

---

*Foreign Affairs*, 2022/11-1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fter-neoliberalism-all-economics-is-local-rana-foroohar> (2023年9月1日檢索)

動性的力量——對中國社會的專制結構所能形成的衝擊與重構。因為這一看重，他們更願意將眼前的種種不平等與不正義歸咎於市場化在中國推進的不徹底，歸咎於市場對政治權力結構的衝擊還遠沒有完成。在堅持自由主義的人們來看，對此時的中國來說，更為重要的問題，不是去辨析和批評中國正在加入的那個「全球世界」，而是借用市場經濟的力量，來批評、衝擊乃至瓦解既有的專制結構，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

有人將爭論兩方的觀點歸納為在三個問題上的分歧。其一，如何看待自由和民主的關係，這兩者何者優先？其二，應該率先確保的是效率還是公正？其三，如何看待個人與社會，市場與國家的關係？<sup>24</sup>顯然，雙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既有其內在的政治訴求的差異，也有政治訴求和達成手段之間如何匹配的爭論。刨根究底來看的話，他們之間更為根本的分歧在於，中國對於現代世界的意義。換言之，對於被動捲入其中、失去了中心地位的中國而言，僅是後來居上，成為既有的世界秩序的一員，是否足夠？對此，晚清以降的一路看法是，不僅不夠，而且頗為糟糕，因為那不過是積極加入和徹底承認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沿著這一判斷，人們對中國之於現代世界的意義，也就有了十分明確的期待，即負起打破既定規則的責任，創造出不同於此的世界秩序。<sup>25</sup>進入了21世紀的中國社

---

24 焦文峰，〈當代中國的文化政治現象——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收錄於李陀、陳燕谷編，《視界》第3輯（2001年5月）。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顯然是認同新左派的立場，並據此將論戰對手指認為新自由主義。但這個稱呼是不準確的，因為此時和新左派展開爭論者所秉持的，並非今天一般理解的「新自由主義」，儘管他們之間有關聯。

25 最鮮明直白地表露這一點的，莫過於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的主張：「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

會，同樣無法免於這一意義感的焦慮。中國作為一個有著自身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家，一旦進入現代化進程，其所作所為、成敗得失的意味，對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而言，究竟具有何種意義？這一問題的表現形式雖不盡相同，既可以表現為激進的世界革命，也可能表現為極端右翼的民族主義，但內核卻始終如一。對此時的新左派來說，面對充斥著不公平不正義的全球世界，中國具有何種意義的這個問題自然更為要緊。比如，汪暉在《死火重溫》序言中的總結就頗為典型。他認為，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爭議的焦點並不在於「自由主義，而是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它既包括國內的平等，也包括國際的平等」。<sup>26</sup>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顯然並不共有這一焦慮。他們首先關心的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自由民主化進程，其中包括了社會平等。

至此，如果說，「人文精神大討論」初步提出了在專制政權與消費文化雙重夾擊下的中國人如何展開精神生活的難題，那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則進一步將這個難題放置在了全球格局之中，放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動態關係裡。其對於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作用，

---

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負擔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王曉明、周展安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頁228）鮑吾剛在《中國人的幸福觀》中則通過分析李大釗，指出正是在救亡中國的同時賦予其對世界的重要意義、從而恢復它的中心地位的強烈願望，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接受、蔓延和再闡釋。（嚴蓓雯、韓雪臨、吳德祖譯，《中國人的幸福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Wolfgang Bauer, *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Recurring Themes in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Michael Shaw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

26 汪暉，〈序〉，收錄於汪暉著，《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6。

既在於幫助人們在更深入的全球化進程中定位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危機，充分意識到世界各國在新世紀的同構性；也由此明確此後在中國大陸展開的文化研究，面對的恰是由新自由主義的氾濫所導致的自由與平等、市場與國家之間「非此即彼」的兩難。探索精神價值在這一組亦真亦幻的對立中突圍的可能，捕捉並勾勒精神生活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左突右閃、騰挪轉移，也就成為文化研究需要處理的重要議題。考慮到中國社會的後發現代化的典型性，這一類的探索與捕捉在處理全球性困境時，自是不可或缺。到了這一步，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思想光譜，大體成形。如果將其面臨的問題，從大到小，從根本性的到其在具體進程中的變體加以排列的話，它們是：

首先，晚清時期曾經橫在中國人面前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浮現。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如何看待由資本主義這樣一種生產方式所主導和推動的全球現代化的進程？曾經的種種歷史，是否會賦予它一種看待這一進程的不同的眼光？

其次，在這種眼光下，一個很重要的立足點自然是文化。它不僅是人們長久以來用來把握生命意義、理解精神自由的手段，也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中別具特色的所在。然而，當文化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各種方式迅速納入市場進程，加速組織起來，成為商品的時候，人們是否還能在經濟的標準之外，保有對這一進程展開思考的餘裕，形成評判由此湧現的大眾文化、青年亞文化、粉絲文化等一系列新的文化類型的整體性框架？

第三，在消費文化興起的過程中，中國人被優先賦予了消費者的身分。從這一身分出發，能否最終抵達或形成新的公民身分？這一意識形態再造的結果又是什麼樣的？其變遷的動力將來自何處？特別是，當興起中的消費主義文化，越來越成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人衡量人生意義和社會歷史的唯一依據時，這樣的「唯一」將造成何種後果？在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增長停滯後，不管是年輕人的「躺平」，還是各階層不同程度的「擺爛」，都是這一問題長期以來無法被真正面對，公開討論和妥善處理而導致的社會性後果。

最後，那些意欲捕捉真問題的知識者，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占據何種位置，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這一知識者的自我認知自我期許，勢必和他們怎麼思考和理解上述問題密不可分。

### 三、體制內外：一本雜誌、一套叢書、一個網路和一處系所

顯然，在上述問題的鋪陳之下，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它既無法將整個現代化進程視為理所當然的容器，也絕無可能退回到舊有的榮光裡去——無論這榮光是屬於曾經的社會主義、學科規範還是傳統中國。這使得中國大陸知識者在推進文化研究，尋找文化研究的中土特性時，勢必始終遊走在體制內外，保持一種「橫站」的姿勢。<sup>27</sup>

當然，任何改變，都不是一場單槍匹馬的孤勇者的戰鬥。在這

---

27 「橫站」是魯迅當年說過的話，王曉明用它來描繪中國大陸試圖從事文化研究的知識分子的位置感。王曉明，〈2001年修訂版序〉，收錄於王曉明著，《無法直面的人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頁10-11。在一篇訪談中，汪暉指出：「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文化研究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正處於重新精英化的歷史當中，渴望建立一個美國式的學科制度，所以『文化研究』雖然在美國是風起雲湧的，但是在我們這兒顯然不合時宜」。見汪暉、鄒贊，〈繪製思想知識的新圖景：清華大學汪暉教授訪談〉，《社會科學家》第3期（2014），頁3。



一節我將選取2000年以來對開拓文化研究來說十分重要的制度性建設的面向，以具有代表性的一本雜誌、一套叢書、一個網路和一處系所為例，說明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在出版、審查、學術組織、大學制度這一系列體制內外的遊走狀況。

首先是一本雜誌。在推動文化研究的發展上，1990年代中後期的《讀書》功不可沒。2000年之後，旗幟最為鮮明、影響頗大的，首推李陀、陳燕谷主編的《視界》。從2000年5月創刊，到2004年停刊，該雜誌共出版了13輯。這是一本從各個方面來講都高度自覺的刊物。第一輯的卷首語，便大聲宣稱了辦刊意圖：

《視界》就是針對這樣一個形勢編輯的。在我們看來，今天的中國格外需要理論思考和理論研究。現在，幾乎人人都同意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或者叫做社會轉型，但是，究竟應該怎樣認識這個變革？這場變革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前景？知識生產和這變革的關係又該如何？這些問題還遠沒有得到深入研究和討論。何況，就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對這些問題的思索，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爭論而言，其意見之分歧，立場之對立，可以說已經充分顯示了知識界與當前的變革的關係是多麼錯綜複雜。且不論各方的意見是深是淺，這些不同的理論表達究竟和現實的發展，特別是和以城市為軸心的各種經濟活動有什麼樣的聯繫，它們究竟代表或象徵了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它們的對立和論爭在何等程度上反映了改革以來形成的新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還有，它們和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潮流、勢力、利益又究竟構成了什麼樣的關係，這一切本身就又是當前理論界不能不面對、也不能不重視的重大理論課題。……但是所有這些重大理論課題，都不能依靠常識的通俗化



的理論來解決。相反，嚴峻而複雜的現實要求我們不但要進行嚴肅而深入的理論思考，而且還要大大發展理論，在當代理論建設上做出貢獻。應該說，《視界》正是為此而生，它願意為以理論回應現實，同時在這過程中為發展理論盡一份力。

.....

在實現這個目標的努力中，我們希望在《視界》上發表的文章能夠避免花哨的空談和不負責任的概念遊戲，建立一種踏踏實實研究問題又平易近人的文風，使理論寫作與現代漢語有一個更為親密的關係。.....我們希望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也能深入到現代漢語的理論寫作當中，不僅是文風、句法、修辭風格要盡可能符合漢語習慣，而且要努力創造自己的理論概念和理論語言。<sup>28</sup>

顯然，在第一期的卷首語中，主編就給自己也給後來者開列了一張在中國大陸展開文化研究的任務清單，列出的事項包括：首先，拒絕越來越通俗化商品化的理論販賣，以嚴肅的理論思考回應現實，並據此發展和形成自己的理論；其次，這一思考不僅針對的是中國社會，也必須以世界為範圍展開與推進，同時也必然是反西方中心論的；再次，它希望和過於規矩的「學術」劃清界線，在寫作的語言、體裁和欄目設定上將這一點鮮明地凸顯出來。在其後刊發的文章中，的確不光有理論性很強的學術寫作，也包括了紀實、散文、評論等等。最後，充分重視不同的符號類型。比如在編輯刊物時，

---

28 李陀、陳燕谷，〈卷首語〉，《視界》第1輯（2000年5月），頁ii-iii。

如何利用圖像符號的問題在一開始便被提了出來。這意味著，對文化研究而言，只要有利於呈現和傳播其對於當代社會的整體性的把握和批判性的理解，一切可供驅使的手段都應該毫不猶豫地利用起來。

時隔20年，卷首語所批評的現象——「花哨的空談」、「不負責任的概念遊戲」、「理論的通俗化操作」，依舊盛行，甚至於更加氾濫了。即便是在以文化研究為業的人之中，擁有當年那樣自覺的人，也日漸稀少。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自有它傳播擴張、變得條分縷析的部分。然而，對照這一任務清單，其日益萎縮不斷後撤的部分，卻也同樣醒目。這並不是說當年《視界》上的文章有多麼出色，而是希望指出：隨著C刊制度在學術體制內確立合法性甚至於唯一性，各新興學科在教育部學科目錄的規範下迅速擴張，由此形成的學科意識也不斷強化。這樣的擴張和強化，又與經費的專案化管理和考核的績效化彼此配合。這些都使得此後的文化研究很難再有這種初興時的野性與氣概。<sup>29</sup>

其次，是一套叢書，「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

南帆曾這樣評價：「李陀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眾文化批評叢書』可以視為文化研究本土實踐的第一批標本」。<sup>30</sup>的確如此。在當時，「知識分子圖書館」、「當代學術稜鏡譯叢」等一批叢書

---

29 比如，創刊於2008年的《熱風學術》試圖延續由《視界》所開創的這一風氣。但出版審查制度總導致刊物無法按時出版，於2016年改為線上出版。即便如此，《熱風學術（網刊）》在陸續出版了19期後也暫時停刊。到目前為止，在體制內唯一堅持下來的以書代刊且成為C刊集刊的是由周憲和陶東風主編的《文化研究》。這意味著，《文化研究》必須遵守既有的學術規範，在近乎苛刻的審查制度下運作。

30 南帆，〈「書與批評」欄目「特別推薦」〉，《文藝研究》第7期（2005），頁136。

致力於大量翻譯西方前沿文化理論，經由譯介來傳播文化研究，推動其發展。而「大眾文化批評叢書」則是本土研究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該叢書一共10本，陸續出版於1999年到2003年之間。放在今天來看，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幾點。其一，旗幟鮮明地針對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大眾文化，將認識和解釋這一大眾文化和中國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視為自身的任務。換言之，在中國大陸，大眾文化之所以受關注和被研究，是因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時尚雜誌、報紙廣告、購物商場、娛樂節目等等，成為了進入和揭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生產機制問題的最佳入口。其中，王曉明主編的《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 and 文學分析》和戴錦華撰寫的《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對這一點的把握和呈現，尤為鮮明。在王曉明看來，這些看起來蓬勃興起中的文化產品，共同構築起一種對於「成功」的定義，使得「成功人士」的身分想像日漸豐滿。然而，在過於詳盡地勾勒「成功」在家居、飲食、應酬和消閒方面的樣貌的同時，一個現代人同樣需要關心的政治、生態、性別等問題卻是缺失的，自由、公正和藝術創造的問題也一併消失不見，最終形成了一個只有「半張臉的神話」。戴錦華則以「廣場」為例，仔細描繪了它如何從充滿政治性的能指變身為後革命時代狂歡的消費空間。這種不斷將「政治」從人們的意識中剔除乾淨的過程，也是消費文化持續填補進自由意志的進程。最終，消費領域擴張為唯一可以進行「自由選擇」的領域，並由此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城市生活方式。

這種旗幟鮮明的捕捉與把握，也形成了叢書第二個特點，即對於中國當代社會的歷史語境尤為敏感，且對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過程中的責任，有相當明確的自覺。叢書出版之際，主編李陀接受《天

涯》的訪談，明確提出：「現實的需求是最強大的動力……由於中國知識界面對著兩個歷史，一個是社會主義歷史，另一個是資本主義歷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糾纏在一起，構成極其複雜的經濟、文化現象，大眾文化的發展也由此十分獨特……這一切都形成了對文化研究的挑戰」。<sup>31</sup>他由此判斷，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將對世界文化研究的發展做出貢獻。

這套叢書第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在於，無論是多人合作還是單人撰寫，作者的學科背景從文學批評、社會學到城市研究，所討論的對象十分廣泛，涉及的領域和問題頗為多樣，從酒吧文化、日常生活中的消費主義、青年角色到金庸的武俠小說。當然，其中的問題也十分明顯。比如，將西方理論運用於中國現實時的種種「不匹配」和「過於匹配」，究竟站在何種位置去把握和分析大眾文化等等。這些問題在「理論旅行」的過程中十分常見，在之後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發展過程中也反覆出現。

令人遺憾的是，此後，我們似乎再也沒法找到這樣一套以問題意識為編輯線索，將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本土研究集中呈現出來，且頗具規模的叢書了。日益的學科化、專門化和經典化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叢書安身立命的首選。畢竟，如果不想擁抱既成事實，而是要從意識形態生產機制的角度對大眾文化加以深挖，自然造成了從各個方向齊頭並進的集體探索的難度，也大大增加了無法出版的風險。

其三，一個學術思想的交流網路：亞際文化研究的交流網路。自1994年《讀書》發表關於文化研究的對談以來，一條或明或

---

31 李陀、楊建平，〈失控與無名的文化現實——訪「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主編李陀〉，《天涯》第1期（2000），頁139。

暗的線索便貫穿其中。那就是對於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觀念的強調和由此呼籲的第三世界的大聯合。對於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而言，這條線索的形成與接續，除了對後殖民主義等既有理論的引介，更來自於其與亞際文化研究網路的接通。這一網路，旨在實現亞洲各地區之間圍繞「與現代性遭遇」這一歷史性時刻而展開的思想資源與社會文化狀況的互通、比照與交流。其形成有兩大來源：首先是以台灣陳光興教授為首推動的「亞際文化研究」網路。通過將溝口雄三的「以中國為方法」改寫為「以亞洲為方法」，陳光興提醒所有有志文化研究的亞洲各地的人們，眼睛不要只盯著西方，而是要相互看見。<sup>32</sup>只有這樣，才能在展開在地思考時形成後發者之間的參照系，發展出重新理解世界史的可能。此外，對於由中國現當代文學出發的文化研究來說，圍繞「魯迅研究」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媒介、以中文為主要語言而形成的學術思想的流動，則構成了與「亞際文化研究」彼此疊加又不完全重合的又一重來源。這也是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所銜接的亞際文化研究網路，略不同於其他亞洲各國之處。

需要強調的是，這是一張持續運動中的網路。它不僅意味著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韓國、日本、印尼、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等地的文化研究學者在其中展開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也是指不同語種的期刊間的支援與連動，<sup>33</sup>更意味著一種新的聯合教學、互通有無的可能性。比如，「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

---

32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

33 比如，台北的《亞洲文化研究》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新竹的《人間思想》、上海的《熱風學術》、北京的《讀書》、首爾的《創造與批評》和《文化／科學》，東京的《當代思想》，新加坡的《圓切線》之間對於相類似議題的關注與彼此的互動啟發。



合體，到目前為止，已聯合了亞洲各地13所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所，每兩年組織一次名為「亞際文化研究」的暑期營，編撰以此為目的的英文和中文兩個版本的亞際讀本。<sup>34</sup>再比如，在千野拓政和王曉明兩位老師的主持下，由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和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於2008年創辦的文化研究類的研究生論壇，已經發展壯大為如今的五校聯合論壇。與此同時，這樣的交流和研討，還包括在設置系科、建設課程上的彼此借鑒和相互參考。<sup>35</sup>

至此，很難想像，離開了亞際文化研究網路與中國大陸文化研究之間的彼此參照和相互影響，僅僅依靠與歐美學界的單向度的交流，孤立無援的試圖反抗西方中心論的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會是何種面目。同樣無法想像的是，一旦與這個網路越來越疏離，思想和情感上的隔絕重新籠罩彼此之時，又會是何種局面。

最後，是一個系所，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sup>36</sup>

如果說期刊、叢書和學術思想的交流網路，相對而言仍能比較方便地遊走在體制內外（包括出版制度、審查制度、經費制度、通關規定等等）的話，那麼，要在中國大學內部建立一個系科，就遠沒有那麼靈活方便了。它不僅涉及到大學內部一整套穩定死板的科

---

34 這兩本讀本分別為：Tejaswini Niranjana and Xiaoming Wang, eds, *Genealogies of the Asian Present: Situat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Hyderabad: Orient Blackswan 2015)；羅小茗編，《反戈一擊：亞際文化研究讀本》（上海：上海書店，2019）。

35 比如，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在建立時便借鑑了台灣交通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世新大學等設置文化研究相關系所的經驗。

36 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大陸高校中，進入體制、實現突破、遭遇險阻的並不只有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一家。但因為要討論的是文化研究在體制內遇到的具體的困難和問題，因此就只能就筆者比較熟悉的系所為例。



層制度，也須直面「大學到底培養什麼樣的人」這一持續變動的要求。當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開始傳播和流行之時，一個問題經常被拿出來討論。那就是，文化研究既然既反體制又跨學科，那麼它還要不要進入大學體制，成為它的一部分？

對於這一點，建立起中國大陸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文化研究系的王曉明老師，這樣判斷：

反體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之一。可是，在中國，目前依舊是政府獨大的集權體制，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資源，都在體制以內。因此，如果不進入現行的大學體制，不向這個體制借力（資訊管道、經費……），文化研究可以說根本就開展不起來。

更重要的是，越是成熟的現代社會，學校教育的作用就越大，而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對學校教育的影響，也可能是更為深刻。今日中國，低收入階層子弟所遭受的智力損害，已經使學校教育成為在人身上複製——而不是打破——現存社會的不平等結構的主要場所。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研究豈能不介入大學教育，放棄對這個決定社會未來的領域的爭奪？<sup>37</sup>

顯然，一旦進入黨國體制下的大學，文化研究中另一個重要的主題——介入現代教育體制——自然具有別樣的難度。畢竟，利用體制往往也意味著被體制利用。

正是在充分意識到這一風險的情況下，2001年上海大學中國當

---

37 王曉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為例〉，收錄於王曉明，《近視與遠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267。

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文化研究機構。2004年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成立，成為中國大陸首個專門的文化研究教學機構。2012年，作為上海大學自主創設的二級學科，獨立的文化研究碩士點和博士點開始招生；接受不同專業的本科生報考。2022年，在教育部強行要求每個一級學科必須用一張統一的考試卷的大形勢下，文化研究被剝奪了獨立招生的資格，納入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的管理。雖然仍接受不同專業的本科生來報考，但統一試卷下的中文學科初試，顯然大大提高了非中文專業考生的備考門檻。可以說，僅「能否獨立出卷招生」這一項在十年中的變化，就呈現出「硬著頭皮擠入現行大學體制」和盡可能保存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反體制特點之間的張力。

顯然，到目前為止，這場體制內的「教與學」的冒險，仍在繼續。<sup>38</sup>若要對這一場仍未完成的冒險做一些最為簡略的介紹和概括的話，它們包括這樣幾條線索：

首先，在展開文化研究教學時對於媒介手段的積極運用。2003年2月，當代文化研究網創立，它隸屬於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文化研究的學術和教學網站。在這一網站的開創之初，仍是BBS的年代。網站開闢了文化研究課程的BBS討論區，同時設有「熱風」主論壇，以方便大家討論公共議題。2010年6月，圍繞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展開的論壇討論，以《「城」長的煩惱》為名出版。此後，伴隨著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短

---

38 2009年之前的種種舉措，比如組織上海地區的碩士聯合課程，作為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體的成員參與亞際聯合課程、不設立文化研究的本科學位而只提供本科選修課程等等，王曉明老師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為例〉中都有比較詳盡且全面的說明。

視頻等平臺形式的興起，網站也隨之改版，吸納新的媒介形式，至今為止已經是第四個版本。在今天看來，一個系所擁有自己的網站和公眾號，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但放到更長的時間段裡來看，便會發現，積極運用新的媒介手段，讓學生嘗試著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參與在網路世界之中，不僅由此瞭解社會文化的狀況，且發展出對於當下社會現實的批判性理解和實踐的能力。這構成了上海大學文化研究在教學中的基本思路。此後，無論是學生自製的網課還是播客節目，<sup>39</sup>都是這一思路的延伸。

其次，是社會實踐課的興衰。當2012年文化研究系開始正式招生授課時，如何將文化研究的理論學習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免於專業化和學科化，便是其在設置課程時遭遇的一大問題。受台灣世新大學社發所社會實踐課程的啟發（不幸的是，社發所如今也因不符合「要求」而停招了），文化研究系也設置了同名課程，以便在制度上確認文化研究對社會實踐和理論學習之間關係的基本看法。結合中國大陸可以和急需展開實踐的社會空間的狀況，在一開始，當代文化研究網、「我們的城市」市民論壇和「新工人」文化共建活動，共同構成了實踐課的內容。此後，隨著城市和網路世界裡各類公共空間的持續萎縮，實踐課一度陷入了停滯。到目前為止，如何重新構想和建設將理論與現實，思考與實踐結合起來的文化研究實踐課，仍是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三，是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相關教材的編撰。在推介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有兩類編撰教材的做法比較常見。一是翻譯文化研究的經典教材；一是篩選西方的研究成果，編輯某一主題的讀本。這兩

---

39 由文化研究系師生自發拍攝編輯的網路課程包括「改變這個世界：文化研究在中國」、「一期一會：文化研究方法論」；播客節目則有「日常生活讀書會」、「魔都夜奔」等。

種通常的做法對於擴大文化研究的聲勢，讓更多的年輕人儘快瞭解西方既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貢獻卓越。相比之下，強調在與西方文化研究的對話中凸顯文化研究的中土特性，這一部分的教材編撰則近乎空白。在文化研究系展開的教學研究活動的基礎上，王曉明在其主編的「熱風叢書」中設置了「講義與讀本」系列，致力於嫁接西方文化研究的傳統與中國當代的現實狀況，尋找思考中國現代性問題的獨特的思想資源，推動形成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自身特性。到目前為止，已推出的「講義與讀本」中，《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與《反戈一擊：亞際文化研究讀本》重在推介亞洲各地的文化研究成果，以便與亞洲各地的文化研究者「相互看見」；《中國現代思想文選》則重返中國在遭遇現代的歷史初期，梳理泛左翼的思想光譜，整理其中的思想資源，使之成為大陸文化研究重新思考中國問題時的重要線索。《巨大靈魂的戰慄》和《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則嘗試從當代青年的角度出發，或通過經典的文學作品，或經由周遭的日常生活，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論做初步的介紹，促其思考。這些都是促進文化研究在中國現實土壤中生長和壯大的具體努力。

十年來，隨著教育體制的變化，社會對於人才要求的變化，文化研究始終不斷調整著教與學的方法，協調著體制內外的勾連與結合，希望在這條窄道上走得更遠一些。然而，目力所及之處，可以伸展的空間卻日益逼仄。在全球化進程遭遇結構性的阻力，不再高歌猛進，中國社會變得日趨保守的情況下，文化研究究竟應該怎麼做？這個問題自然不會有明確的答案。只能說，到目前為止，文化研究在進入大學體制之後，是最終成為一個僵化的學科，還是因為拒絕僵化而被體制視為異質的力量逐漸排斥消滅，尚未有定論。

#### 四、文化研究的中土特性：以作為文化生產機制的「居家生活」研究為例

文化研究自詡不是書齋裡的學問，它在向大學體制借力的同時，也在不斷打破大學高牆的壁壘，與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形成一種連接，彼此滋養。如果如此，那麼，究竟什麼樣的研究可以連接與滋養更廣闊的社會空間，而非跟隨現實的亦步亦趨？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中，現實總是兀自奔馳，人文學科的研究或一葉障目，或疲於奔命。在大數據出現之後，社會輿論更習慣於將人們的生活放置在既「不可解」也無需解釋的位置上，習慣於放棄對現實的把握，退縮入無可奈何的精神狀態之中。在此形勢下，回答文化研究提出的初始問題，也就變得更為緊迫。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之間的彼此嚙合和相互加強，構成了這樣一種社會集體的心智狀態？如果將源源不斷地生成這一整體心智狀態的社會再生產概括為一種「文化」的話，我們應該如何勾勒這一文化？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1990年代以來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的研究，便是嘗試之一。<sup>40</sup>

乍看之下，中國的住房問題似乎沒有過去30年間那麼刺目了。這是因為，絕大多數的00後，要麼因這輩子都買不起房而徹底放棄，要麼因有來自祖輩和父母的幾套房可以繼承，也不再憂慮單純的居住問題。然而，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便會發現，從1980年中央領導人指示建造「商品房」，到2015年中央籌畫「去庫存」，以各種政策來

---

40 參見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探索與爭鳴》編輯部聯合出品的《1990年代以來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的研究報告，王曉明：〈什麼是今天中國的「住房問題」〉，《探索與爭鳴》2016年9月，頁14-21。



調控樓市，乃至疫情之後各地樓市的多番起伏，都未能解決作為社會問題的居住問題，反而讓「城市式居家」作為一項社會問題，滲透和牽動的範圍越來越深廣了。它不僅關涉到各級政府對於樓市的態度和對經濟問題的基本理解，也是普通人生活中將居住和戶口、階層、教育、醫療等重要的社會資源配置問題緊密關聯起來的核心所在。這意味著，對當代中國而言，住房問題並不會隨著主觀態度或客觀形勢的變化而消失。它雖是生活必需品——任誰都需要居住，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獲得了遠遠超過居住功能的種種價值，成為持續勾連著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什麼是成功」、「什麼是中產」、「什麼是城市生活」、「什麼是可預期的未來」、「人為什麼而努力」等一系列社會想像的重要源泉。當人們發現，無論怎麼省吃儉用都買不起一套房，無法完成階級躍升，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它也就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第一道刺目的裂縫。

就此而言，住房問題也就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而是一個持續構建著社會結構與社會意義，也因此必須從文化生產和意識形態構造的角度加以把握的領域。「1990年代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的研究，試圖命名和勾勒正是這樣一種勾連著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域，並在過去40年的中國社會生活中發揮著生成人們生活意義和價值的關鍵作用的一個重要「文化」部件。說清楚什麼是都市青年理解的「居家生活」，也就等於說明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文化部件，其在整個的支配性文化生產機制中的位置和作用。

這項研究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後，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制度／結構基本形成，它由三個子系統構成，通過彼此間配合完成對中國社會的再生產。首先，是以維穩為首要目標的國家政治系統，它引導人成為頭腦靈活的順應現實的公民。其次，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系統，它相當有效地將人塑造為合乎市場需要的勞動力和

興致勃勃的消費者。三是以「城市式居家」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統，它負責向人們提供生存的基本意義，從而減輕前兩個系統帶給人的精神和生理上的種種壓抑。可以看到，這三個系統的配合越是默契，它們對中國人的塑造能力也就越強大，即便有各式各樣結構性的矛盾與失衡，社會整體的運行仍相對穩定。而一旦這三個系統之間的配合出現嫌隙、彼此抵觸，那麼，整體性的運作也就勢必失靈。

某種意義上說，今天年輕人的躺平佛系，因覺得「明天不一定比今天好，還可能比今天更糟」而不願意再努力，恰恰是後兩個子系統——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系統和以「城市式居家」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統之間無法配合的結果。個人展開生活的興致以及由此獲得的意義感，不僅無法在這兩個系統內得到生成、印證和安頓，反而因這兩個子系統之間越來越無法匹配而落空。這種落空，之所以無法避免，又是因為，在過去的20多年裡，儘管分配機制的嚴重傾斜造成不可化解的社會矛盾的堆積，但人們仍習慣於從以「城市式居家」為中心組織起來的日常消費中體驗人生的意義。年輕人在這三個子系統的配合中接受教育，成為在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唯有通過日常消費才能感受到生活意義的新類型的中國人。而隨著經濟增長的停滯和消費降級的到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失去了通過日常消費來把握意義的這一管道。如此一來，如何才能讓他們繼續安於做一個順從現實的公民和一個市場所要求的積極合格的勞動力呢？顯然，對如今的中國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無法僅僅依靠個人和家庭來處理和消化的大問題。

至此，勾勒和澄清這一作為子系統的「城市式居家生活」，說明它如何將現實規則（包括經濟制度、政府執法模式、主流媒體、學校教育等等）和主觀認知（對工作、家庭、經濟、資產、愛情、健康、生育和教育的理解等等）這兩個層面組織交匯起來，也就十分

重要了。它已經成為解釋今後社會文化趨勢、青年動向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生產的變數時，必須澄清的一個基礎。概括起來，這套「城市式居家生活」系統有這樣幾層含義。首先，它是都市的，往往指中產式的消費能力和趣味，「追隨時尚的休閒和娛樂習性」；其次，它是非公共的，不僅遠離公共政治，也盡一切可能地遮罩與政治相關的內容，比如勞資關係、公共權力等；第三，它的意義往往維繫於通過積極消費帶來的新鮮感。由此確立起來的消費者身分，成為當代中國青年確立自我意識、身分認同、工作事業的追求、對家的認可與營造，乃至未來想像的重要依憑。一旦失去了這一依憑，個體、家庭、事業和未來、社會如何聯繫起來，就需要被重新回答。而這恐怕也是攤開在新一代年輕人面前，令其困擾又不知如何尋求新解的大問題。無論是選擇躺平還是內卷，只要沒有回答這個大問題的能力，人生和社會的危機，恐怕都難以真正避免。

顯然，新世紀以來的住房危機，既是新自由主義蔓延後全球社會普遍遭遇的問題，同時也極具中國特色。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這份研究報告，從勾勒和澄清當代文化生產機制出發，對這一既具有普遍性又十分特殊的文化部件——「城市式居家」給出了初步的論述。而以「城市式居家」這一文化部件為核心，業已出現裂縫的支配性文化生產機制如何在此之後展開演化，則是下一個十年需要文化研究者們進一步追蹤和捕捉的。

## 五、結語：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有未來嗎？

文化研究從來不是一個學科，它既沒有登上過教育部的名目，也不曾勘定學科邊界，大搞專案。可以說，其最終退出學術弄潮兒的視野，是可期的，若不是必然的話。然而，如何檢驗它在這30年

來的得失，評估它的潛能，展望其未來，又是迄今為止，堅持在這條窄路上的人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在這裡，不妨比照1995年王曉明在《人文精神尋思錄》編後記中對這場大討論概括出的看法：

儘管我們今天置身的文化現實處於深刻危機之中，但作為社會面對危機的重要方面，當代知識分子或者當代文化人的精神狀態普遍不佳，喪失了對個人、人類和世界的存在意義的把握，並在信仰和認同上兩手空空。這種狀況是由近代以來的歷史過程中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而要擺脫這個狀態，不僅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更需要持續提倡一種關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不斷培植和發展內心的價值需求。<sup>41</sup>

若以這些當初社會危機初步現形時獲得的看法，來檢驗中國大陸文化研究30年來的歷史的話，便會發現，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逐步發展變化的同時，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危機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更加深重了，中國知識人乃至當代中國人這種兩手空空的精神狀態，也並未得到真正的改變，反而越發觸目驚心了。或者說，頗為諷刺的是，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努力發展自身的這30年，同樣也是中國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的力量迅速強大，聯手將文化玩弄於股掌之中，將其持續邊緣化，不斷剝奪人的尊嚴感，使其最終喪失了組織和形成自身文化的能力和興趣的30年。

---

41 王曉明，〈編後記〉，收錄於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

然而，同樣可以明確觀察到的是，社會輿論和各路媒體越來越關注當代文化現象。這自然不是文化研究的功勞，而是當文化問題在社會運作和經濟生產消費的過程中越來越重要之時，資本市場和國家權力的合力使然。可以說，備受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特別是與當代青年直接相關的文化現象，提供了文化研究在更廣闊的範圍內發揮作用的可能性。就此而言，無論是不斷引發爭議的女性主義話題，上了985 / 211等高校卻自稱廢物的求職者聯盟，還是討論當代工作究竟有何意義，這些公共議題實際上都是經由對當代文化議題的關注，帮助大家不斷形成對於周遭生活的初步理解，邁向不同於主流的關乎精神和價值問題的獨立思考。在這裡，展開爭奪的也依舊是李陀當年在《視界》的卷首語中所說的，真正嚴肅認真有力量的理論思考與通俗化的商品化的理論販售。區別在於，今天的理論販售得到了流量經濟的加持。但網路時代這一爭奪展開的規模之大、能見度之廣，又是2000年時無法想像的。這也正是文化研究可以大展拳腳之處。

至此，一旦將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發展放置在社會整體性危機的形成與演進這一社會脈絡中去看，那麼這種自我理解的思路必然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危機在持續加深，也預示著，越是面對勢必將所有人裹挾而去的大危機，就越是文化研究一展身手的歷史際遇，無論體制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

就讓我們以這樣的共識打底，期待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在下一個十年的新旅程，期待在「初極狹，纔通人」之後，終有「豁然開朗」的時刻出現，也期待著「為什麼是文化研究」最終可以被用來界定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得以續寫的「什麼是文化研究」。

2023年4月初稿



2023年5月28日修改

羅小茗，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教育研究、城市文化與日常生活分析、科幻文學研究；「我們的城市」市民論壇主辦者之一（2012-2017），《熱風學術（網刊）》主編（2016-2020）；著有《形式的獨奏：上海「二期課改」為個案的課程改革研究》（2011）、《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2015）、*Unlocking the Future: The Urban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23），編有《反戈一擊：亞際文化研究讀本》（2019）等。